

遇“敬”、“镜”等字皆须避讳，或以‘鉴’字代‘镜’”。“镜湖”从此亦称“鉴湖”。凌毓楠刻此书时，未为深究，将“镜湖遗老”误为陆游别号。此书卷前“镜湖遗老”题记有：“元祐壬申余卧疾京师”之语，陆游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上距元祐三十余年。其尚未出生，岂能“卧疾京师哉？！凌稚隆既然不知“镜湖遗老”为谁，则“镜湖遗老”之评语真伪更可怀疑。此书在凌刻之前，不见传本。因而其来历甚可怀疑。难怪叶德辉在跋尾这样评说：“明嘉万以后，刻书多不知来历，大都如此”。

## 对《中国古典文献学》的一点意见

王红元

吴枫同志著《中国古典文献学》（齐鲁书社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，以下简称《文献学》）一书出版后，有的报刊发表对此书的评介文章。我认为该书中出现一些问题，大醇小疵，在所难免。这里，谈一点我对此书的意见。

一、第81页：“按我国古时典籍多刻写于竹简之上，秦汉时公牍文书不得随意更改，多用刀刻写，所以《史记》称肖何为‘刀笔吏’。”

竹简上的文字是刻的抑是写的，何谓刀笔吏，这些问题早在几十年前简牍实物尚未大批发现的时候，学者们就在他们有关的论著中考证、辨明了。近人王国维的《简牍检署考》，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篇比较详尽的考证简牍之制的文章。他根据《管子》、《韩诗外传》等古书的记载，断定：“……此足为周时已有墨书之据。且汲冢所出《穆天子传》必书于魏安釐王以前，而为墨书，则战国以后无有用刀刻者矣！”这篇论文写于1912年，距今已七十余年。王重民先生1927年发表的《刀笔考》，不仅认为战国时刀笔之用“笔以墨书，刀以削误”是确而有征的，而且征引古籍，将“刀笔吏”也解释清楚了。七十年代初陈梦家先生、钱存训先生等的有关专著中也详加论证。况且，迄今为止，尚未发现其上的文字是用刀刻的竹简；相反，足以作为强有力反证的实物——从晋上溯到战国的墨书简牍倒时有发现，而且战国时

墨书的工具——毛笔也早在1954年重现于世。至于所谓刀笔吏，是因为在简上用墨笔写字，误写或需要重新使用该简的时候，就用刀削去一层表皮。这层被削去的薄薄的有字的表皮，名曰梯，本世纪初，敦煌烽燧遗址中就出土过很多这种梯。刀和笔是写字的工具，所以称办理文书的官员为刀笔吏。

如果对竹简稍加研究或者稍加了解，对以上问题就不致于有这样错误的认识。

二、第49页上作者列举了明代著名的抄本。经笔者查对，其根据是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卷十《明以来之钞本》的一部分。《书林清话》在谈到某一名家的抄本时，其顺序是籍贯、姓氏、字或号、名，最后是室名。这就难为了作者。像吴宽、文徵明等，作者是知道的，但不熟悉的，列举时就出了问题。例如《书林清话》原作“杨钞，常熟杨梦羽仪七桧山房钞本也”，这是说，杨钞，指的是常熟人杨仪字梦羽的七桧山房钞本，作者却写成“杨钞（常熟杨仪七）”。如果只此一处，那么还可能是偶而疏忽所致，可是接着看下去是“姚抄（无锡姚咨茶）”，《书林清话》原文是“姚钞，无锡姚舜咨咨茶梦斋钞本也”，这是说，姚钞，指的是无锡人姚咨字舜咨的茶梦斋钞本。终明一朝，根本没有杨仪七和姚咨茶其人。

《文献学》在《古籍体式》这一节中（见第76页），关于古籍作者署名的形式问题，也谈到了古人的姓名、籍贯、字号、官职、室名、斋名，甚至还有死后的谥号等问题。可是又发生上述谬误，说明作者也许仍然搞不清古人的姓、名、字、号、室名等，难怪作者列举明代钞本时要舍去《书林清话》中的“叶钞，先十八世族祖文庄公赐书楼钞本也”，作者可能更搞不清这位叶家的老族祖“文庄公”是何许人了。

三、第50页：“传世最古的唐代印刷品是太和二年（828年）、乾符四年（877年）刻的两本日历以及咸通九年（868年）雕印的《金刚经》，已被伯希和从敦煌盗往国外。”

这段话中就有两个史实错误：一是太和二年乃中和二年之误，828年应为882年。我们只要翻开张秀民先生著的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》（人民出版社1958年初版）直到近年来广文等编写的通俗读物《我国古代四大发明》等书，载有“中和二年”年号历日的书影就会赫然在目；二是把这几件希世珍宝掠载而西的是捷足先登的英国斯坦因，并非接踵而至的法国伯希和。在斯坦因劫夺的藏品中有两本唐刻历日的消息是在三十年代末期

发表的,在一段时期内,有些人还不知道,例如五十年代初北京图书馆编印的《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·中国印本书籍展览说明》中就误作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,换句话说,以为是被伯希和盗走的。此后,很多文章甚至某些专著中都沿袭这种说法,《文献学》出版于八十年代,也仍然以讹传讹。至于举世闻名的唐咸通九年刻本《金刚经》,盗主斯坦因1921年就在其《西域考古图记》中供认不讳。这是一页令人愤激的中国文化上的伤心史,我们专搞古典文献学的人,是不应将这件被盗国宝窝藏的地点搞错的。

四、第51页：“乾德五年（923年）贯休和尚自刻《禅月集》。”

前蜀贯休和尚的《禅月集》，有其门人昙域和尚乾德五年后序，此书的确刻于是年（后序撰于乾德五年十二月十五日，阳历已进入次年，所以应该是公元924年）。清人莫友芝在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中说：“书籍刻板始于唐末，然皆传布古书，未有自刻专集，昙域后序作于王衍乾德五年，称检寻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，雕刻成部，则自刻专集，殆自是集始，是亦可资考证也。”这里“自刻专集”的涵义，要与全段文字联系起来看，才能理解正确。前面说书籍刻版开始于唐末，但都是传布古书，没有刻专集的。这里的“专集”与“古书”对举，是泛指一个人的集子，而《文献学》理解为刻自己的专集。问题就出在这里。贯休卒于公元912年，怎能会在死后十一年自己来出版自己的集子呢？其实我们如果将昙域和尚的后序全文那怕是浏览一过，就不致于发生这样的问题。昙域在蜀乾德五年癸未岁序中是这样说的：他的师父于壬申岁12月（壬申为公元912年，12月1日阳历即已进入次年，所以应为公元913年）逝世，葬事完毕以后，很多人关心其师的诗文，“不暇枝梧，遂寻检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，乃雕刻版（另一版本作“成”）部，题号《禅月集》。”从昙域后序中，贯休卒于何时，其诗集雕刻于何时以及是谁为之出版的，不是很清楚吗？

另外，还必须指出的一点是，这本书的讹字是相当多的。这里略举一、二如下：

人名曹溶讹为曹榕（第140、223页）、书名《艺风堂藏书记》讹为《芝风堂藏书记》（第175页）、书坊名尹家书籍铺讹为尹家本籍铺（第182页）……，而麻沙本的“沙”，在第183、188两页四见皆讹为“纱”。

至如行文首尾互不呼应，出处张冠李戴等仓促成书的痕迹随处可见。

其他问题还很多，由于本文旨在指出《文献学》的谬误，不是对该书

做全面的评论,在这里就不详谈了。

作者在书的前言中说:“感到有必要写一部小书(指本书),希望以此引起文史学界开创新领域”,这一希望是好的,对于发展学术、对读者、对自己各方面都是有益的。

笔者简陋,读书很少,上面所谈,也未始无错,还希望广大读者指正。

## 关于蒲松龄的“闹中越幅被黜”商榷

杨海儒

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于康熙二十六年(公元1687)秋天赴济南参加山东乡试,因“闹中越幅”而“被黜”。他的词《大圣乐》(闹中越幅被黜,蒙毕八兄关情慰藉,感而有作)记为:“得意疾书,回头大错,此况何如!觉千瓢冷汗沾衣,一缕魂飞出舍,痛痒全无”。(《蒲松龄集》)。

对于蒲松龄的“闹中越幅被黜”过去并无异议,但近年来随着蒲松龄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,有的专家、学者对此有了新的见解。如李厚基的《蒲松龄的生平与著作》一文中言:“他游历下,应乡试,但闹中越幅(答卷不合八股的规定格式)被黜”;马瑞芳的《鬼狐史与青云路——漫谈蒲松龄和他的〈聊斋志异〉》一文中言:“蒲松龄历下应试,因闹中越幅(文章超过限定字数)被黜”;马瑞芳的《料应厌作人间语,爱听秋坟鬼唱时——蒲松龄生平简介》一文中言:四十八岁时历下应考,因“闹中越幅,(八股文超过了限定字数)被黜”,殷孟伦、袁世硕编《聊斋诗词选》(1983年版)中的注释为:“《大圣乐》:词牌名。康熙二十六年(1687),作者参加山东乡试,由于作文超过八股文所限定的字数,被取消继续参加这科考试的资格,即题中所谓‘闹中越幅被黜……(164页〔注释〕①)’,‘得意’二句:是说在科场里